

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中国金融发展战略

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2008年10月9日

一、“里根革命”的终结与美欧困境

美国次贷危机揭露出 80 年代以来，所谓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发动的市场化革命，导致西方社会的深层危机。西方 30 年代的大萧条向全世界揭露出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性。凯恩斯学习了社会主义的方法，用国家监管金融市场、政府推动公共工程、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等办法来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美国罗斯福总统最终还是通过加入二次大战，发展军火工业的办法走出大萧条。美国政府战后推行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创造了西方社会约 30 年的繁荣。到 70 年代，美国同时进行越战和搞福利社会，形成滞胀，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首次动摇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战后苏联、日本、西德和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实力。

里根 80 年代上台后又采取自相矛盾的经济政策。他对内实行自由主义，大幅给富人减税，削减政府的公共开支，同时又搞“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企图从经济上拖垮苏联。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他不惜大举借债，造成强势美元，迫使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首先转移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当美国压迫日本和东亚货币升值以缩小贸易逆差时，又迫使这些制造业从亚洲小龙向中国大陆沿海转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好抓住了“里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

美国今天面临的金融危机，根源首先在里根 80 年代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70 年代末出现的金融衍生工具完全置于政府监管之外，导致 90 年代虚拟经济的规模约 10 倍于实体经济，造成今日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之二在于小布什总统继承里根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持续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方面继续给富人减税，搞赤字财政，使美国的公共债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为了获得选票，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历届政府都拒绝改革美国过时的高消费经济结构，拒绝适应美国经济衰落面临的挑战。每次面临经济危机都用降低利率的方法来刺激国内消费，同时利用美国的军事和金融霸权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错误政策买单，其结果不但造成美元疲软，而且接连产生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终于导致今天全面的金融危机。美国不得不在大萧条后，再次对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企图用金融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挽救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应当指出，欧洲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长期以来，英国在电气化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输给德、日、法国以后，一直靠金融自由化维持着伦敦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目前同样深受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金融衍生市场套牢之苦，而英国央行

救市的能力远远不如美国。与美国近 30 年来的减税政策相反，欧盟为了维护欧元和欧盟东扩，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西德 90 年实施东西德货币统一的休克疗法，摧毁了东德的国有企业，导致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得不大增统一税，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导致整个欧盟增长的疲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欧盟自顾不暇，难于施以援手。欧盟东扩的目标在乌克兰和俄国西部，导致日益增大的与俄国的冲突。同时欧洲老龄化与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又使西欧的福利社会面临比美国更难以持续的经济困局。这是最近欧美在奥运期间同时发生民间反华浪潮的经济社会原因。在苏联瓦解以后，西方社会一度认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如今他们重新产生面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

我们可以说，目前美国发生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冷战后最大的国际变局。也是中国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国内几种流行的理论误区

正确的政策来源于正确的理论对时局的洞察。过去几年，国内若干流行的错误理论干扰了中国政府的决策。如不纠正，将错过历史机遇，甚至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遭遇重大曲折。

1. 人民币汇率低估论。

国内一些学者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而非历史现实中学来的汇率理论，相信汇率的市场均衡说。把中美贸易的大幅顺差，归结为中国的汇率过低，主张人民币大幅升值，客观上将牺牲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屈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他们不明白，美国的持续贸易赤字，是美国军事过度扩张的结果。否则无法解释，技术不比美国先进的日、德等国，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汇率数次升值，为何仍然有持续的贸易顺差。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终于使美国上下获得一致的结论：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自美国内部的错误政策，而非中国的贸易顺差。这对中国国内盲目迷信美国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2. 中国内需不足论。

国内不少学者同时羡慕西欧福利政策和美国刺激房地产、汽车的内需政策，企图要中国的发展战略照抄西方模式，而不顾中国人多地少技术落后的实际国情。近年来大肆鼓吹的中国内需不足，其论据值得分析。

历史上只有西方强权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扩大内需来安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从来没有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先例。二次大战后日本、德国和亚洲小龙的经济起飞，得益于美国的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和越南战争，美军在当地的大量的后勤物资采购刺激了他们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销售渠道控制在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手中。中国产品获得的收益只占美国零售价的 2% 到 5%。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销售网的民族企业，包括宝钢这

样的大企业，也没有产品出口或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不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不首先提升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空谈刺激内需，用西方式的立法手段来提高最低工资和劳力保护强度，只会导致大批出口加工企业移向海外，加剧国内的就业危机和企业生存危机，缩小而非改善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国内有人主张用服务业来取代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们都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服务业：传统的餐饮、旅馆等依附型的家政服务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创新型的信息服务业，前者的发展依赖制造业创造的剩余。即使收入远比中国高的东德，工业不景气也导致服务业的萧条。南亚国家的乞丐满街都是。大观园中的传统仆人服务业难道能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稀少的海岛国家旅游业创造的就业远非中国的制造业可比。相反，创造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依赖政府与社会大规模的投入。中国目前的高校几乎没有创造能力，多为西方理论的传销商，根源在于政府教育支出不足支付教职工的基本工资，逼得各大学靠扩招、卖文凭来变相牟利，无法从事长期实质的创造性研究。只有大幅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有可能再造中国的创新体系，从而奠定改善人民福利的深层基础。

3. 防犯金融风险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论。

中国目前企业的竞争能力，如联想、华为等已上升到国际水平，但缺乏国家政策与金融的支持。中国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银行，资产规模上已经进入世界 500 强，但在国际竞争能力上却无法和竞争性的企业相比。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也即影响股价的主导权，在国外金融巨头手中。美国投行经济学家频频现身中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指手画脚，是美国也无的“新闻自由”。过去西方投行与媒体的联手操作，可以轻易地让中国股市暴跌，廉价收购，然后炒高中国股市高价卖出，中国一月的赢利可以超过西方一年的收益。然而身体庞大而竞争力软弱的中国国有金融企业，至今还陷于亚洲金融风暴流行的“防范金融危机论”中作茧自缚，不敢向中国的汽车工业一样和跨国银行竞争。其根源不在缺乏金融领导人才，而在金融政策和政绩指标的调整不当。

应当指出，中国目前实行的资本流动控制，对防范国际热钱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成功的。也给国有银行前几年的改革争得了时间。但是防范金融风险的说法和要求国有金融机构保值增值的政策是短视的。金融是不流血的战争，做的就是风险生意。毛泽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战术上当然是集中了指挥风险。如果看的准，能以小吃大，化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反之，蒋介石企图用避战的方法保存中央军的实力，只能是越战越弱。国内 97 年后的金融政策，一方面抓大放小，让外资银行入主国有中资银行做战略伙伴，试图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一方面迟迟不敢放开农村与中小城市的民营银行，不让民营银行和民营企业一样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模式。可是西方国家并不对等对中国开放金融。中资银行在西方不能扩大分支机构，中资企业即使大股注资西方金融机构也不得拥有董事席位和投票权。这就窒息了中国出现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的可能。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却

只能买美国政府不断贬值的垃圾债券，不能像欧洲、日本一样收购美国资产。中国如不反击美国不平等的金融政策，却要为美国错误埋单，岂非怪事！“防范金融风险”的口号，等于在中国制造业采取全球进攻的态势下，几乎得不到有巨大储蓄的中国金融业的支持，反而使西方投资银行几乎全面控制中国龙头企业的上市和升级之路。

美国已故金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曾经指出，产权没有全球统一的最优模式，美英特点是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模式是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中国金融目前的主要风险，是过度模仿美国模式，引入经理期权，只注重短到季度或年度的利润，忽视改善中长期的国际竞争地位 and 市场份额。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要注重产业的竞争能力，应当重视德日金融体系对产业的长期支持，防止金融投机以牺牲产业的根本利益为代价。

应当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物质资产可以保值，无论是黄金、房地产、还是机器设备，只要丧失国际竞争力，一度繁荣的东京、香港、和今日的加州，企业会大规模地倒闭或出走，房地产会大幅贬值，倒闭企业的设备如同废铁。中国要求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政策，是促使中资机构大量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和房地产抵押债券的重要因素。当时看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风险远比投资中国企业的风险要大，收益也远为稳定，如今却成为被套牢的金融鸡肋，弃之可惜，嚼之无味。其深刻教训，必须上升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高度，重新认识世界发展史。

三、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机遇

目前中国储蓄强大，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经济增长世界之最，又有强大稳定的政府领导，这些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竞争优势。那么中国金融发展的机遇何在呢？

1. 西方经济越疲惫，越需要价廉物美的中国货。

中国不少经济学者误以为西方经济下降必然减少中国的出口市场，其实总量可能下降，但产品穿透力反可能增强，例如廉价省能的汽车和家用电器。西方的自由化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公共设施衰落，企业竞争能力下降。但是西方的议会政治，又使政治家争相许诺维持已有的生活水平，拖延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人民越穷越买便宜的进口货，进口越多失业或借债越多，造成产品和资本都依赖中国的恶性循环。这和中国富了才买西方进口货的行为正相反。假如西方搞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暂时阻止少数夕阳企业的倒闭，但会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并危害贸易商的利益。所以西方保护主义只是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工具，无法全面实行。除非放弃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换言之，中国企业即使在美国经济衰落时更易乘虚而入，扩展出口。日本和韩国的汽车、电子产业就是成功先例。

2. 系统收购西方的金融和营销网络。

美国国会通过的 7000 亿美元的拯救计划，只是挽救市场信心，不一定能拯救大型金融机构。如不把美国资产大规模向国外出售，无论是加税还是利率升高，都会把美国经济推入进一步的萧条。用战争刺激经济的办法，例如对伊朗动武，只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让已经处于破产边沿的三大汽车公司加速瓦解。当年是 IBM 主动请联想收购其个人电脑业务。和难以信任的中东产油的伊斯兰公司相比，来大规模购买美国的资产，美国政府和金融界早晚会请求中国帮忙挽救美国的金融体系。问题是 中国买什么？开什么条件？是急于示好，还是谈谈等等，静以待变。

中国企业和领导人这次必须清醒，美国真正值钱的不是房地产、国债、黄金或过时设备。日本 80 年代巨资购买美国的明星地产吃了大亏。美国最有价值的是其商业网络，例如三大汽车公司和连锁店的营销网，如果部分掌握在中资手里，就更有利于中国产品进入西方市场，并提高利润分成比例。

其次是美国的金融与信息网络。例如美国的老牌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信息出版巨头，中资公司如能掌握相当股份，将显著改善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上海才有可能与纽约、伦敦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注意兼并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

西方创新的源头在中小企业，创新成功则多数为垄断企业所兼并。中资要尽可能在平时兼并掌握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危机时兼并掌握大量专利技术的大企业，便能加速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能力。战略收购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的金融决策机构，不能以财务指标主导，而必须以产业的技术政策主导。这是中国金融业目前远不如西方同行的地方。中国必须要从体制上大力调整国有金融机构，才能推行技术竞争战略而非资产保值战略。

4. 美中欧共建新雅尔塔格局，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二次大战后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强瓜分势力范围的结果。近年欧元的产生动摇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历来国际资本流向有两种相反的机制。一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区，目前是中国和东亚国家，二是流向最安全的地区，以前是美国和瑞士，9-11 之后，大批资本流出美国，造成欧元强势。美国打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间接制衡了欧元，导致欧美离心力日增。假如没有中东、俄国与西方的冲突，美国要挽回美元颓势，就得打击人民币强势，最便宜的方法是支持台独，制造两岸紧张局势，迫使沿海加工企业倒闭或出走。要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美国政策的被动局面，只能在美国面临重大危机时，和美国政府以及两党领袖达成一揽子的地理政治与金融的交易，构造新的雅尔塔格局。目前美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讨论重大的外交与金融格局的改变。中国必须事先成竹在胸，避免就事论事，才能一举缔造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格局。

最近两件事应当引起国内领导人注意：一是美国纽约时报 1 月 27 日发表了题为“告别霸权”的长篇文章，摘要介绍了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战略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卡南（Parag Khanna）的新书《第二世界：新全球秩序中的帝国们及其

影响》，书中一反前些时美国支持日本、印度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制衡中国的主张，明言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只有三大“帝国”：美国、欧盟与中国。三家又合作又竞争的主战场在第二世界，包括俄国、印度、巴西、土耳其、伊朗等国家。新美国基金会是谷歌（GOOGLE）总裁等新技术领导人发起的，跨越两党的新思维智库，主张大幅调整美国冷战以来的思维与国际战略。此书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可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相比。

二是今年六月中，笔者作为唯一的一名中国经济学家，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美欧高层经济学家会议。会议主题是“后布雷特森林金融体系与国际安全”，研讨美元动摇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办法。与会者最终一致接受笔者对美欧经济的分析，承认能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是 G8（西方八国联盟）或者 G20（加上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而是美国、中国和欧洲。西方经济学家不断问我同一个问题：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究竟能持续多久？我的回答是应该问一个相反的问题：目前的美国模式和西欧模式还能维持多久？正是他们的否定回答给我们如下启示：只有美、中建立国际安全与金融体系的长期互信安排，才能维持美、中、欧的相对稳定汇率，继续目前美国主导、但欧中积极参与的全球化。我指出，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于补贴美国的过度消费，对美国和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赔钱买卖。但是中国与美国相互投资企业和市政建设，不但经济上是互利的，国际安全上也是建立互信的前提。

中国在构造新雅尔塔协定的下一论高峰会上，必须改变政经分离的外交策略，力争和美欧达成一揽子政治经济的长期协议。应当理解美国政治没有什么道德或信用可言。周恩来当年和基辛格签署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联合公报，只是保留了双方的政治面子，在国际法上对美国并无约束力，反倒成为美国和他国压迫中国在解决问题上让步的筹码。我们应当学会和美国做地理政治交易。当年罗斯福为了换取斯大林出兵东北进攻关东军，拿牺牲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做政治交易。我以为这次美国面临空前的金融危机，中国可能以美国废止台湾关系法案和终止武器售台为条件，建立中美长期经济合作的一揽子交易。包括中国注资金融系统，同时要求中美对等开放金融，双方在金融、能源、交通、大学等方面交叉投资，作为增加互信、减少冲突的长期保障。

由于美国科技比中国先进，中国学生的学习能力高于美国，这些领域的对等开放，只会加强而非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只要中国政治稳定，随时可用反垄断法制衡西方跨国公司，保护中国的经济安全。所以，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议会政治下的西方，在开放的世界中更有竞争力。

许多中国人担心中国在金融上的开放竞争，正如不少中国人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事实证明如今是西方而非中国，更怕平等的开放竞争。中国应对自己的金融企业竞争力保持信心，正如我们对中国的制造业极有信心一样。我的一些学生一直在投资银行工作，而且十分成功。他们认为和西方金融大鳄一争天下的时机已

经到来。只要我们政策对头，不难吸引全球华人甚至西方的金融高才为中国服务。

四. 中国金融体制的战略调整。

假如中国领导人决心从亚洲金融风暴时采取的防御战略，转为当今美国金融危机时的进取战略，就如毛泽东的游击战转为运动战，中国的金融体制应当如何适应金融战略的转变呢？我的建议如下：

1. 国资委对国有大企业的直接控制改为通过大学基金会的间接控制

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海外上市，已经引起西方的高度警觉。他们的防御办法是抓住中国的国企性质实行准入限制，包括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限制主权基金在西方的经营范围。

中国建立国资委、以及国有的中投公司，仿照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是中国设计者忘了地理政治因素：新加坡对西方不构成战略威胁，中国、俄国则不然。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出面收购西方有科技含量的企业（例如联想收购 IBM 的 PC 电脑）或者西方油田，立即会被西方议会以国家安全名义加以限制或封杀。

中国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科技强大的基础，第一是土地赠于大学(land grant university)，如笔者所在的德州大学基金会，2007年的资产高达156亿美元，加州大学也有64亿美元，美国的星球大战实验室主要立足于这两个州立大学，加上国防研究经费的巨额资助。建校时州政府把大片公有土地划为州立大学的校产，德州大学的土地上还发现了石油，租给石油公司开采，保证了科技研究的持续能力。私立的哈佛大学的实力，来源于免税的私人捐款组建的哈佛大学基金会，资产高达346亿美元。在中国获得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包括耶鲁大学（基金资产114亿美元）和斯坦福大学（基金资产172亿美元）。中国的北大、清华、科大等重点大学要和西方一流大学竞争，如不建立类似规模的大学基金会，并鼓励大学研究与产业研究长期合作，就不可能建立中国的自主创新体系。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史正富，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时，建议把国资委控股的体制，改革为国有企业集团为基础的十几个大学基金会的控股体制。例如宝钢的资产划分别划拨给北京科技大学和清华等工科大学基金会。中移动的资产分别划给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基金会。基金会的构成与大学的研究领域和相应产业的发展方向相关联。各大学基金会之间的竞争与各产业的升级严密相关。有产业科技背景的大学基金会在选择支持国企领导人和制定产业政策上，可能比国资委或发改委的行政官员更具战略眼光。党政干部中已经显示企业家业绩和产业规划远见的干部，可以安排在相应的大学基金会中，体现我们的干部政策。党的领导和国务院的战略规划，包括廉政干部的退休安排，也可以通过大学基金会的人事安排及高管任命否决权间接实现。这也将大大提高政府效能，减少用人为亲与腐败可能。

如果中央能采纳及时我们的建议，就可以从形式到内容，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包

装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营”（这里是“全民”而非“私有”）企业，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理地解释为符合国际规范的共有（public own）混合（mixed）经济，扫除中国资本大举进入西方资产市场的法理障碍。

假如西方限制中国大学基金会的收购行为，中国可用世贸规则对等限制西方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的行动。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今天，美国比中国更需要外资。

2. 建立战略性的民间研究机构。

面临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仅仅几个月前，西方投行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主流电视报纸上不断出现，宣传人民币应大幅升值的主张。中国学术界与舆论界受西方自由主义媒体的影响，几乎盲目地要求人民币升值。政协委员中还有人荒谬地主张全国每人发 1000 元来拉动经济。对于中投公司收购黑石公司与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战略行动，虽然时机稍早付了点学费，但显示了中资对美方的善意，为中国金融领域的进取战略奠定了基础，才有今日美国试探中资进入的可能性。这样前瞻性的战略意图却遭到政协与人大委员的高调指责。究其根源，是中国两会代表的业余性质缺少国际眼界和历史知识，难以求全责备。但中国缺少像美国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独立的又有影响的民间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行政研究机构难以超越现行政策的约束，也不易影响民间舆论与政府决策的互动。要提高政协与人大委员的问政水平，发展民间外交，必须建立独立长远的民间研究机构。

中国目前与国际金融战略有关的部门众多，缺少长远规划。建议中国设立精干的跨部门小组，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研究中国金融的战略转变。同时鼓励设立高水平的民间长程研究机构，以基金会形式吸收政府、民间以及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可以称为《和谐社会研究会》，或类似罗马俱乐部叫《北京俱乐部》也行，名义上可以挂靠在政协或人大，以研究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包括国际、金融、生态、安全等问题，以制衡西方的话语权和所谓的人权外交。也可为政府间谈判做方案试探和前期准备，例如与西方的民间智库做定期交流与对话等。

总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大国。制定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已经不能用国内政策需要来应对国际变化的格局了。今天中国的领导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比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实力地位更有基础。如能抓住国际变局的大势和机遇，就能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生事业更上层楼。

参考文献：

Parag Khanna, New America Foundation, “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 27, 2008. A feature story about the new book by Parag Khanna, 《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8).

史正富、刘昶, “民营化、国资委化还是社会化? --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 《思想与对话》,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 2007年5月。